

模仿，其前提就是所谓宋玉《舞赋》本身是一个自足的完整的有机整体。根据所谓宋玉《舞赋》来看，其本身不是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是有着明显的删节痕迹，理由如下：

因为从内容上判断宋玉《舞赋》是否自足，由于其本身就是作为待定的对象，不能成为自身的绝对判断标准。我们可以同时代《招魂》中的歌舞描写为例来看这类歌舞的描写特点。《招魂》中歌舞描写主要包括演出的环境，演员的服装，演员的舞姿以及演出的过程，演出之后的一些活动。汉赋中《七发》、《子虚赋》以及京都大赋中的歌舞描写都是如此。而在宋玉《舞赋》中，就缺少演出环境的描写。在傅毅《舞赋》中，“夫何皎皎之闲夜兮”至“改恒常兮”一段，用优美的文字，描写了君臣夜宴，酒酣人醉，得意忘形的情形，为舞蹈的展开设置了一个必备的背景。这种对“舞的场景的渲染”，与“舞”这一核心内容的展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同样适于对结尾的分析。所谓宋玉《舞赋》中，舞蹈完毕，便戛然而止，这也不符合舞蹈描写的惯例。在汉赋中，一般舞蹈结束后，都有类似尾声性质的描写。傅毅“于是欢洽宴夜”至“聊以永日”一段，写歌舞结束，遣客夜归，主要铺写车马行状，与舞蹈描写没有直接关系，但却是一个过程的组成部分。

另外还能找出形式上更加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一问题，有三个细节应该充分注意。第一，“尔乃郑女出进，二八徐侍”一句之“尔乃”。“尔乃”本为时间性连词，表示动作的承接或先后或是转换话题。在《文选》所收赋作中，“尔乃”均起这样的作用，和“于是”同义。在《古文苑》本中，这个词用法显得非常突兀。因为宋玉刚刚“唯唯”，接着就来了个“尔乃”，本无所承，何来“尔乃”。但是如果把它看作是节略本来看，这一“尔乃”用得便顺理成章。因为宋玉“唯唯”之后，首先写的是跳舞的场地环境。“尔乃”接着叙述，并有转换话题之意，很自然地由场地转到服装

的铺陈，这是删节的重要直接证据。第二，就是关于“兮”字的删节，在《古文苑》本中，下列两句单句末没用“兮”字。“貌嫋妙以妖冶，红颜晔其阳华。眉连娟以增绕，目流睇而横波。”这里有两个问题：一、假设真为傅毅增补，傅毅为什么此处加上这两个“兮”字而其他文字照抄不改？二、不用“兮”字不符合此类内容宋玉所用句式的格律。宋玉在《神女赋》中，也有一段类似相貌描写：“貌丰盈以庄姝兮，包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馥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文选》卷一九，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淳熙本，第268页）在单句末尾位置都用了“兮”字。如果《舞赋》真为宋玉所写，这种现象难以解释。相反，如果看成是傅毅创作，《艺文类聚》进行了删改，就顺理成章。删掉了“兮”字，舒缓的节奏感没有了。这样删节，基本成为对句，符合六朝以来骈文发展的规律，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而且根据现有的材料看，《艺文类聚》或是《初学记》确实存在删掉“兮”字的惯例。第三，关于“亢音高歌为乐之方”。“高歌”的是什么，所谓宋玉文中并没有下文，而是直接开始舞蹈描写，这显然不符合此类内容常规的表达格式。在这种语境中，“歌”之后要么有唱词，顺承唱而来，要么对歌进行评价。所谓宋玉《舞赋》之所以马上转到舞蹈描写，就在于删除了的缘故。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宋玉之赋明显是删节而成，不是自足的。相反，把它当作傅毅的作品来看，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在序言中陈述俗乐的合理性，接着描写了跳舞的场地，演员的服装，他们的舞姿，跳舞之后的分散回家，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总之，通过《舞赋》文献版本比对以及流传引用的考察，通过对宋玉《舞赋》文本存在问题的分析，足以证明傅毅是《舞赋》的真实作者。宋玉创作《舞赋》，傅毅进行模仿之说不能成立。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

李白赠何昌浩诗系年

咸晓婷

李白生平事迹与诗歌系年研究向来是学界的一大难题，诸多学者在这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取得了卓著

的成果，如詹锬、郁贤皓、安旗等，但是到现在为止，相互分歧乃至错讹之处仍在所难免，这一方面固然是由

于李白诗歌本身长于抒情而少于纪实的特点，而另一方面，文献资料的不足也是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扑朔迷离的重要原因。

李白集中有两首赠何昌浩诗：

赠何七判官昌浩

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啸咤，思欲解世纷。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夫子今管乐，英才冠三军。终与同出处，岂将沮溺群。（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82页）

泾溪南蓝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筑，

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

蓝岭耸天壁，突兀如鲸额。奔蹙横澄潭，势吞落星石。沙带秋月明，水摇寒山碧。佳境宜缓棹，清辉能留客。怅君阻欢游，使我自惊惕。所期俱卜筑，结茅炼金液。（《李太白全集》卷一四，第695页）

关于这两首诗，诸家年谱与全集注释大都不编年，唯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将两诗同系于上元二年（761），而安旗等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编前诗于天宝十载（751），编后诗于天宝十三载（754）。这两种系年均是错误的，而安旗考订何昌浩为安禄山范阳节度使判官，奉安禄山之命劝说李白入幽州幕（《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870页），更是大误。2005年5月，河南首阳山镇南蔡庄出土了《唐故邓州司户参军何府君墓志铭并序》，墓主何府君即何昌浩，也即是李白诗赠寄的对象。墓志记载何昌浩家世、生平及仕宦经历甚详，这为我们重新考订李白这两首诗的作年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为读者方便起见，兹将墓志内容抄录如下：

府君讳昌浩，字□□，庐州潜人也。曾王父武，婺州永康县令，赠岱州都督。王父彦先，天官、地官侍郎。父凤，越府都督。代袭文德，郁为儒族，蝉冕纓裘，辉焕史牒，鼎门余庆，生我府君。府君即都督第二子也，气迈神朗，操履特达，早尚属文，兼志博览。著《九流指要》十卷，事穷造化，义尽幽微。解褐泽州参军，辞满调授本州录事参军，督辖群曹，郡无留事，抵法犯禁者，滕劾不回，代不容直，且无知人。左迁光州定城县丞，俄沾沛泽，移邓州司户参军。无何，二京覆没，遂潜迹江表，为宣歙采访使宋若斯辟署支使。天不慙遗，罔佑其善，官舍遇疾。以永泰二年薨，春秋五十二。夫人博陵

崔氏，光禄卿通理之孙，随州枣阳令珣之女，源流派深，柔德婉茂，享年六十六。嗣子士用，前试左卫率府兵曹参军，旅寓江汉，不遑底宁，实遵独家之仪，将展充穷之思。以贞元癸酉岁十月日合葬于河南府偃师县首阳之源，礼也。述累世之徽猷，揣繁祉之茂绪，恭承懿范，备阐前闻。铭曰：庆集德门，季父温温；文学政事，景命不伸。博陵茂族，早结嘉姻；日落同归，万古不春。首阳新塋，偃师故里；树列松楸，兹明终始。（载于周剑曙、赵振华、王竹林《偃师新出土唐代墓志跋五题》，《河洛文化论丛》第3辑，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334页。墓志拓片载于该书第323页）

对照李白赠何昌浩诗与《何昌浩墓志》，有两点需要辨明一下。第一，李白在诗题中称何昌浩为“何七”，这似乎与墓志所云“府君即都督第二子也”抵牾不合。但是我们知道，唐人习惯按曾祖所出而定排行，而不是按一父所生的兄弟长幼次序计算，如称白居易为“白二十二”，称李绅为“李二十”，所以李白称何昌浩为“何七”与墓志所云“府君即都督第二子也”并不矛盾。第二，根据墓志，何昌浩一生仅一入幕府，即为宣歙采访使宋若思辟为支使，而李白在诗题中称何昌浩为判官，这似乎又是互相矛盾的。事实上，唐人有以判官泛指幕僚的习惯，如岑参有《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李商隐《为安平公兖州奏杜胜等四人充判官状·李藩》云“伏请赐守本官，充臣观察支使”（《樊南文集》卷二），都是以判官泛指幕僚，其中包括支使。盖判官在使府中的职责为分判诸曹事，地位甚高，仅次于副使，唐人以之泛称幕僚有尊崇之意。如此，则李白称何昌浩为判官与何昌浩在使府中的实际职务为支使亦不矛盾。

再就地点而言，何昌浩所在宣歙采访使的治所为宣州，而李白第二首诗所云“泾溪”恰恰在宣州境内，这一点墓志与白诗正好吻合。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此碑志的墓主何昌浩即是李白诗题中所云何昌浩，李白的这两首诗应作于何昌浩任宣歙采访使支使期间，而何昌浩一生根本没有任职安禄山范阳节度使幕府的经历。安旗先生根据李白曾北上幽州的经历，推定何昌浩是幽州范阳节度使幕府判官，并奉安禄山之命邀请李白入幕显然是错误的。李白在天宝十载至十二载之间确曾北上幽州，但是并没有受到安禄山的邀请，而是自行北上。至于李白北上幽州的动机，安旗沿袭前人的观点认为是他为了探察安禄山叛乱的虚实，而查屏球的《李白北上幽州考》

则指出李白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是无功而返（《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333页），文章论析甚详，读者可自参看，兹不赘。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何昌浩任宋若思宣歙采访使支使的时间来重新考定李白上述两首诗的写作时间。根据墓志，何昌浩“二京覆没，遂潜迹江表，为宣歙采访使宋若斯（当作“思”）辟署支使”，安史之乱爆发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不久洛阳陷落，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756）六月，潼关失守，长安陷落，那么何昌浩入宋若思宣歙幕至少要在天宝十五载六月之后。关于宋若思任宣歙采访使的时间，据《旧唐书·玄宗纪下》：天宝十五载六月庚子，“以监察御史宋若思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旧唐书·房琯传》：天宝十五载十月，“琯请自选参佐，乃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旧唐书·地理志三》江州至德县：“至德二年九月，中丞宋若思奏置。”又《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五建德县：“唐至德二年，采访使宣城郡太守宋若思奏以此地山水遥远，因置县邑，仍以年号为名，属寻阳郡。”由此可见，宋若思天宝十五载六月为御史中丞，是年十月参与策划了房琯收复两京的战役，他以御史中丞的身份出任宣歙采访使兼宣城郡太守应该在至德二载（757）。据《旧唐书·肃宗纪》，乾元元年（758）五月，肃宗罢各地采访使，又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乾元元年，郑灵之任宣歙节度使，可见到乾元元年，宋若思已离任宣歙采访使，而这一年，李白也已经踏上了流放夜郎之路。因此，李白赠何昌浩的这两首诗只能作于至德二载秋天。白诗云“沙带秋月明，水摇寒山碧”，知时令在秋。

宋若思是李白故人宋之悌之子，二人私交甚深。至德二载，李白因永王璘事而身陷囹圄，幸先后经崔涣及宋若思出力解救，方得脱狱。宋若思至德二载以御史中丞出任宣歙采访使，李白陷狱寻阳时，恰逢宋若思“专征出海隅”，“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李太白全集》卷一一，第561页），于是设法营救。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云“前后经宣慰大使涣及臣推覆清雪，寻经奏闻”（《李太白全集》卷二六，第1218页），终于“脱余之囚”，将李白释放出来。宋若思是解救李白寻阳之狱的重要人物。宋若思不仅将李白解救出狱，而且将其收归幕下，让李白参谋幕府。李白与何昌浩应该就是在这

期间认识的，他的《赠何七判官昌浩》诗应作于与何昌浩初识不久，诗云“终与同出处，岂将沮溺群”，即指李白参谋幕府，而何昌浩任支使事。

应该说，李白在宋若思幕府度过了一段相对愉快的日子，他为宋若思掌管文书事务，作有《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为宋中丞祭九江文》，并随宋若思往武昌一行，有《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诗。不仅如此，宋若思还专门具表向朝廷推荐李白，李白亲撰此文，即《为宋中丞自荐表》。按，《为宋中丞自荐表》是李白生平研究至为重要的资料，因为李白在表中自叙年龄云“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五十有七”，清人王琦定此表作于至德二载，并以此核定李白生年，对于此一说法，近当代学术界基本无异议。然《中国李白研究》2000年集发表了吕华明《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写作时间考辨》一文，吕文提出了李白该表应作于乾元三年（760）的新说法。对于该说，2003年杨栩生发表了《对〈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写作时间考辨〉的几点质疑》（载于《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反对吕说，坚持王说。笔者认为，吕华明一文的考证过程有遗漏重要环节之嫌，譬如他论证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的写作时间，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李白约略作于同时的另外两篇文章《为宋中丞祭九江文》与《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而这两篇文章显然都作于至德二载九月长安收复之前，因此，说李白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作于乾元三年是站不住脚的。李白此表仍以系于至德二载为宜，这与本文考定李白赠何昌浩诗作于至德二载是一致的。

从李白后来所作诗歌来看，他在宋若思幕府的时间并不长。李白至德二载这一年命运起伏极大，先是于春间因永王璘事陷狱寻阳，初秋获释后入宋若思幕并随其武昌一行，但不久即离开。学者们已指出，李白在离开宋若思幕府之后，“逃难”卧病宿松，并向张镐赠诗求援，有《赠张相镐二首》，到年底，终被判长流夜郎。不过现在看来，李白在卧病宿松之前尚有泾溪之行，《泾溪南蓝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筑，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即作于此时，尔后才从泾溪前往宿松避难，到宿松时已是深秋或以后，且已卧病。将李白这一时期的诗歌贯穿起来，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白的惧祸心理越来越强烈，当初在宋若思幕府时，尚是神采飞扬的，初返泾溪，心情还是轻松的，有“卜筑”、“炼金液”之雅兴，到卧病宿松时，则转如意气消沉，“卧病宿松山，苍茫空四邻。风云激壮志，枯槁惊常伦”（《赠张相镐二首》，《李

太白全集》卷一一，第598页），到年底，心境已是苍凉无助了。

至于李白离开宋若思幕返回泾溪逃难宿松的原因，现在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说明。郁贤皓先生在《李白晚年行踪及思想考论》一文中曾推测道：“按理，永王被杀，其部下主要将领季广琛等早已投靠肃宗，只有李白被投入狱中，经过宋若思和崔涣推覆清雪，事情也已了结，没有必要在事过半年多后再来追究永王的事。也许正是

这个李白的《自荐表》，才使朝廷又重新处理永王事件。宋若思也可能听到朝廷的议论，才让李白离开幕府，到宿松‘逃难’。”（《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第一卷《李白丛考》，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也许正如郁先生所说，正是李白的不合时宜的奏表，重新引起了肃宗集团的注意，并最终再引祸端，长流夜郎。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东游记》十九回蓝采和歌词考源

崔小敬

明吴元泰《新刊八仙出处东游记》是八仙传说的定型之作，其十九回“采和持拍踏歌”载“采和歌词十二首”，自“歌云”、“采和二歌云”至“采和十二歌云”，计录五言八句诗十二首。对这十二首诗的来源，赵景深较早提出可能来自已失传的明来集之《蓝采和长安闹剧》：“《东游记》第十九回前半用《续仙传》，后半似用来集之的《蓝采和》。惟此剧今已失传（钱静方《小说丛考》卷上面九八），后有‘长歌一曲，皆醒世之言’的情节，也许《东游记》后半的十二支歌是引用明萧山来元成的吧？”（《八仙传说》，《东方杂志》第30卷第21号）但实际上来剧尚存倘湖小筑本，其中并无这十二支曲子，因此吴光正认为“这十二支曲子恐怕另有所本，待考”（《八仙故事系统考论：内丹道宗教神话的建构及其流变》，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2页），周晓薇的看法则游移于二者之间，但总之“目前还未能检得其出处”（《四游记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9页）。其他八仙研究者虽多，但大多未注意及此。现笔者经过搜检，已可断定这十二首诗系本自寒山诗。不过，《东游记》现存明刻本一种、清刻本数种，相关文字有所不同；寒山诗版本系统更异常复杂，已知著录及传世的版本有百余种之多，各本不仅文字小异，编排次序不尽相同，且各诗均无编号。为便于比照，《东游记》选择现存最早刊本明余文台刻本（《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四辑《新刊八仙出处东游记》，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寒山诗则选择中华书局2000年项楚《寒山诗注》本（以《四部丛刊》影

宋本为底本），将二者对应关系及异文列为表一（异文用黑体字表示）（为便于排版，列表见下页。——编者注）。

从表一可以看出，采和二歌与寒山诗二六五首、采和十二歌与寒山诗〇三六首完全相同，其余十组则存在或多或少的异文。分析这些异文，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因寒山诗版本问题产生的异文。经笔者比勘，明余文台刻本《东游记》所录蓝采和歌词似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无我慧身本《寒山诗集》最为接近，前者之二、三、五、八、十二首均与后者相应各诗文字完全相同，而与中华书局本有所不同。寒山诗本身的异文可参看中华书局本各诗后校勘记。

其二，属明显讹误的异文，如第一首之“珍箠”、“露”，采和六歌之“暮”、“禅”，采和十歌之“斫”、“名”，或因音讹，或因形讹。

其三，虽非错误却存在其他问题的异文。如采和七歌之“魁梧”，单从字面上讲，意思并不错，但就全诗用韵而言却不押韵。赵景深批评吴元泰较余象斗水平为低时，就指出《东游记》中“诗句也有不少处不押韵”，并举此诗，谓：“以‘梧’（引者案：应为‘梧’）‘鬼’与‘多’‘何’‘歌’押韵，应该说是作者自己的错误。”（《读〈四游记〉》，《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24页）现存寒山诗版本“魁梧”均为“瑰玮”或“魁伟”，显然是押韵的，此处“梧”字可能因“魁”字连带所及，但未必全是吴元泰的错误，也可能出自刻工之误刻。

另外，除这十二首蓝采和歌词出自寒山诗外，《东游